

构筑元时代的理论版图：评唐小林《信息社会符号学》

谢林杉

书名：信息社会符号学

作者：唐小林

出版社：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 年

ISBN：9787030721495

DOI：10.13760/b.cnki.sam.202301022

有关信息社会的广泛讨论，起源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一个概念——后工业时代。1978 年，日本和美国传播学者的一次会议提到第一本标题有“信息社会”一词的书在北美出版。同时，“信息经济”“信息活动”“信息工作”等相关概念在大西洋两岸流行起来。到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信息革命”正成为政府和企业规划中的一个核心要素。1979 年，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将社会形态划分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并重新阐述了他最初的后工业化论点，强调计算机和电信网络的重要性。同一时期，研究相关问题的《第三次浪潮》和《大趋势》等书问世，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信息社会理论给后工业时代赋予了更实质的内容：工业因信息而获得成功。在此基础上，尼克·戴尔－维斯福特（Dyer-Witheford，1999，pp. 27 - 44）提出了信息社会的七条“革命学说”。此后，对信息社会有着深入研究的曼纽尔·卡斯特提出：“信息社会是一个用来与农业社会或工业社会形成对照的术语，以强调当代经济、政治和文化的重要特征是由信息的作用确定的。信息社会可以被简单地定义为一组社会关系，在此，数据——而非资本或劳动——是价值的最重要来源。”（霍华德，2019，p. 19）

对于信息社会的讨论虽然繁多，但大部分是依据社会学、哲学等学科理论进行阐释的。唐小林（2022，p. 1）认为，信息社会只是人类社会的一个

特殊阶段，“世界的本体是符号，世界是以符号的方式存在的”，“社会的变动实际就是符号的变迁”（p. 8）。因此，以符号学视域讨论信息社会的符号行为及符号文本，是直指文本内核的应然之意。唐小林所著的《信息社会符号学》一书，区别于将“社会”当成符号诱因的符号社会学视角，而将“信息社会”整体看作一个大局面文本，站在符号学的立场，分别从历时和共时两个维度，将信息社会与前序的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并置，从符号构成、符号关系、符号变动以及变动实质四个方面，对人类这三种社会形态的符号状况进行分析，重点厘清了信息社会的符号现状。作者（p. 10）认为：“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信息社会的过程，是从‘物符号’向‘符号物’演进的过程；是从‘物符号’主导向‘符号物’主导过渡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物符号”与“符号物”对社会的决定作用在不断翻转，而每一次改变，都必然带来人类社会诸如文化类型、意义建构方式等方面的根本性变化，我们当下所处的信息社会毫无疑问也面临同样的挑战。

一、重新定义信息与信息社会

尽管作者特意指出该书的研究对象并非“信息”，而是“信息社会”，但这两个概念——尤其是在符号学视域下——的相关辨析依旧都是无法绕开的讨论重点。作者从词源学的角度认为，“information”可以被理解成“万事万物进入形式以呈现出来的过程”（p. 27），而“信息就是为物赋形”（p. 28）。这个定义包含了两个方面的重点。一方面，“赋形行为必然是一种主体行为，它是主客体互动中的一种实践活动方式”（p. 29）。为物赋形就是给事物一个解释，使事物以意义的方式存在于世界之中，而这个带有主观性的解释必然来自有主体意识的人类。作为一种主体行为，“信息是人对数据的某种解释，而如何解释是根据数据接收者的需要、个人的能力元语言、接收当时当下的文化语境、数据本身的价值等来决定的”（p. 33）。因此，信息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符号文本，而是一个有着丰富伴随文本的对象。

另一方面，从以上谈到的关于信息的观点中，我们不难看出，在作者看来，信息并非一个静止的文本，它本身就是一个处于随时动态变化过程中的行为。“信息”一词的背后，隐含了一个传播过程。当我们谈论“信息”时，人的主体意识、媒介间的转换、社会文化语境等多种信息，其实均已不可避免地包含在内。因此，无论从组合轴还是聚合轴上看，“信息”都是一个立体的、多维度的概念。

不同学科、不同领域都对“信息社会”这一概念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与见解，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作者创新地从皮尔斯符号学的三分法出发，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挖掘信息社会根本性特征，提出信息社会“不再是单一的社会形态，不再是一副面孔，而是三副面相，即它是媒介面相、智能面相与消费面相的结合”（p. 39），“媒介是信息社会这个大局面符号的再现体，智能就是信息社会这个大局面符号的对象，而消费则是信息社会的解释项”（p. 42）。皮尔斯三元符号学所具有的开放性和动力性，使得媒介、智能、消费三个面相的发展相辅相成；同时，三个面相的动态演变也使得信息社会在拓宽边界的同时也向内纵深挖掘，形成三维立体的发展态势。作者认为，“媒介是信息社会的文本形态，智能是信息社会的事实形态，而消费则隐藏着信息社会的全部符码”（p. 44）。在符号学视域下对信息社会的考察，无疑应该从媒介、智能和消费分别代表的表意机制、生产机制和动力机制入手，对信息社会意义建构方式进行全方位的讨论。

二、三位一体：作为符号的信息社会

媒介这一面相作为信息社会这个大局面文本的再现体，应该说是铺开在整个社会中最易被感知的部分。信息社会中各种流动的意义通过媒介进行表达，带有媒介特性的符号形成了不同于以往的社会文化主型。同时，数字化新媒介的全方位覆盖，构筑起了当代特有的表意机制。媒介就是信息社会中人类现状的镜像再现。

作者认为，人之所以有别于动物，最实质的区别在于连接。在自然-生物层面，人靠连接抵御动物，从自然界中脱颖而出；在社会-文化层面，人靠连接形成“类”，也即社群，将力量集结，有针对性地解决生存难题，并逐步发展属于人类自身的文化；在思维-实践层面，人类的行为和形成的事实作为媒介，将观念与意识作用于客观世界，让自在世界与实在世界连接。连接不仅是人类社会的本质，也是媒介的本质。尤其是在当今信息社会，“‘人-机’连接是网络社会的最主要特征之一”（唐小林，2022，p. 51）。作为社会与媒介本质的连接，随着媒介发展阶段不同，也相应有着不同的形态。媒介的演变经历了口语-身体时代、文字-书写时代，再到数字-网络时代，连接的方式相应也从强连接降至弱连接，又转变为超连接。“超连接既是网络社会的本质特征，也是信息社会的文化主型”（p. 61），连接行为使得人类意识的意向性作用于实在世界，为意义活动奠定基础。同时，“控制信息的

□ 符号与传媒 (26)

权力不再独属于国家机构，它存在于媒介网络之中，而媒介网络是由社会关系和传播技术构建的”（pp. 20 - 21）。实际上，重要的不仅仅是信息，还有信息的结构和组织方式，正因如此，对连接的控制必然成为文化权力和意识形态争夺的焦点。

信息社会的超连接建立在数字化新媒介的技术发展与广泛使用之上，新媒介的普及改变了文字媒介时期人类的表意方式，也建构了新的社会表意机制。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中谈道，在媒介的发展过程中，一种已有的媒介往往会成为新媒介的内容。这就是说，技术和内容的结合生产出一个具体的媒介形态，当这个媒介形态日渐成熟后，在与新技术发生碰撞的情况下，又会产生一个新的媒介，其发展呈现出元媒介趋势。赵星植（2022，p. 37）认为，元媒介时代的符号文本或符号活动，并非指向客观世界的对应物，而是指向其他媒介或其所再现的符号内容。作者（唐小林，2022，pp. 106 - 117）对此也持相同的看法，他认为信息社会万物皆媒导致媒介自指，同时也进一步指出，媒介自指造成诗性符号大量涌现，从而构成信息社会的文化景观。所谓诗性符号，即超出实用意义的人造符号，在符号的生产环节和文本形态上有明显的人为特征。诗性符号批量生产，无孔不入，充斥于信息社会当中，而其得以大规模生产的原因，则在于作为生产机制的双层框架所带来的便利性。作者受到符号叙述学中双层区隔理论（赵毅衡，2013，pp. 72 - 80）的启发，认为诗性符号的生产机制是双层框架，“第一层框架是文本框架，它使符号成为人造符号，这是文本诗化的第一步；第二层框架是标示框架，它使人造符号超出实用意义”（唐小林，2022，p. 118）。大量的符号通过双层框架被人为制造出来，但信息革命使得符号、意义、信息等存在的空间被消灭。“信息社会是这样一个社会：它通过把事物提纯并分解为信息单位的方式‘消灭’事物又‘重建’事物，并按照人的欲求实现原有事物的提档升级和新的赋能。”（pp. 127 - 128）这种事物的“重建”，其实质就是一种通过编码、解码实现的符号生产方式，它为失去空间的信息单位重构了新的空间。“装框”这种意义生产的方式在之前的社会形态中一样存在，但在信息社会中，它已经成为最具普遍性和主导性的意义生产方式。

智能作为信息社会的三相之一，对应的是符号对象的位置，构筑的是信息社会的意义生产机制，而其中，人工智能是最重要也是备受关注的的一个方面。作者对人工智能问题的讨论主要聚焦符号主体问题。有关主体之于符号的重要性，作者（2012，p. 102）谈道，“主体是这样一种东西，它是将各方面问题有机统领起来的枢纽”。早在十年前，作者便关注到符号主体问题，

提出建立主体符号学。智能是获取与解释意义的能力，人工智能便是重建元意识，其核心依然是主体问题。人工智能有遗传性、学习性和意向性这三条获取意义的途径，通过遗传性和学习性获取意义的人工智能，都是带有本能特点的智能，其符号主体依然是被动的。只有依靠意向性获取意义，才能说明人工智能真正具备了意识，而意义的意向性获得必须依赖于自由符号主体的建立。但是，机器的发展一定是朝着完全建立人类意识的目标前行的吗？作者（2022，p. 165）提出，机器的进化方向完全可能区别于人类智能的发展方向，按照机器世界的规则，建立起一套不属于自然智能的人工智能。

对于人类而言，人工智能的发展还有很大的想象空间，但尼葛洛庞帝所预言的数字化生存已然变为现实。前文曾提到信息社会万物皆媒的现状，媒介的发展呈现出元媒介态势。符号即媒介（唐小林，2015，p. 144），元媒介就是元符号，信息社会数字化时代已完成从物符号到纯符号再到元符号的三级跳，元符号、元文化、元意义的达成迎来了元时代。在这个新的时代，物符号、纯符号和元符号呈现出倒三角的关系。赵毅衡（2022，pp. v - vi）认为作者敏锐地认识到了目前发展最急速、占比最大的领域，其重要性实际上只是人类在数字化时代改造世界垫底的活动，即属于物符号领域弱人工智能的发展；元符号领域即强人工智能才是信息社会数字化时代的主导。

信息社会大局面文本的解释项——消费社会，是符号建构的动力机制。信息社会是一个充满欲望的社会，欲望的表现形式之一则是符号的泛滥。消费是满足欲望的活动，但消费社会中的消费行为已然从对物的消费演变为符号消费。作者（唐小林，2022，pp. 20 - 21）认为，游戏最能满足欲望，消费社会的本质是欲望的游戏，因此，游戏是消费社会的主导体裁，从符号六因素的角度看，是一个意动 - 情绪型文本。遗憾的是，作者声明了该书的论述重点，而关于消费社会学界讨论较多，因此没有被作者安排进本书的重点阐释范围，未见详尽的论述。

三、生存还是毁灭：信息社会的文化后果与人类走向

媒介、智能、消费这三个面相各自的特点建构起了信息社会的文化主型、表意机制、意义生产方式。作者立足当下的时代问题，通过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回顾，运用社会符号学的理论，对信息社会符号文本和文化现状进行分析；同时用发展的眼光，延展现今文化与社会现状，对其未来可能的结果与走向做尝试性探讨。

□ 符号与传媒 (26)

超连接作为信息社会的文化主型，其所引发的过度文化可能导致的是弱关系、弱理性与弱文化。赵毅衡（2012，p. 370）曾提出后现代符号危机的四个表现，其一是表意时空距离的消失。信息社会的超连接无限缩短时空距离，社交的高频率并没有正向地提高社交质量，承载了过量垃圾信息的超连接行为反而弱化和淹没了有效的交往信息，使得人与人的关系变弱；其二，连接作为人类信息活动的本质，也挑战着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信息社会超连接产生的交往本质就是获得联系，并不需要进一步导向理解与认同，虽然这样的交往行为增强了个体、社群、组织等之间的联系，但这样的联系较以前呈现弱理性状态；其三，针对超连接带来的超接触，作者提出了“过度文化”这一新概念，它“指文化过度多样，多样到琐碎的程度，多到令人目不暇接的地步”（唐小林，2022，p. 80）。雷吉斯·德布雷（2014，pp. 141 - 181）曾从媒介的角度探讨过基督教在凝聚与整合社会力量方面的成功经验。而现今在超连接导致的过度文化中，看似文化的多样性提升了，实则是文化共享意义的功能降低了，也导致了信息社会动员、整合等能力的减弱。

诗性符号作为信息社会的文化景观，由于其生产机制的便利性，大量存在于信息社会当中，由此触发了人类社会的意义生态危机。作者创新地提出“意义生态”一词，一是希望将更多的注意力引到“人类如何实现意义的栖居”这一问题上；二是希望各种意义社群与文化环境能达到一种平衡和谐的状态。诗性符号不应过度被实用意义填满，堵塞非实用意义空间，造成意义生态危机，而“应该介入生活的内部，达成一种符号/意义关系”（唐小林，2022，p. 123）。同时，由于“装框”这种意义生产方式的普遍，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都打上了框架的烙印，一切都变成了模式化、可套用的操作。如同对连接控制权的争夺，“给框者”也成为各领域抢夺的角色，人们期待变身规则制定者以拥有绝对权力，谋求利益最大化。至此，新的阶级分野与社会不公的现象也出现在信息社会之中。

虽然目前看来超级人工智能还未出现，甚至具有人类意识的超级人工智能是否能实现也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议题，可这样的技术一旦实现，机器成为跟人类一样的意识主体，自然进化而成的人类或将面临历史终结的危险。随着智能机器的发展，人的价值将会从简单领域到复杂领域一步步被取代。不论是工作还是生活场景中，机器的占比越来越重，需要人类出现和付出的场合越来越少，直至人类肉体彻底消失。与此相伴随的，是意义的逐渐消亡。工作、劳动，甚至生活、身体逐渐被机器取代，并没有让人类获得想象中的解放，反而由于逐渐断绝了人类与实在世界的联系，使人的本质出现异化，

逐渐从“机器是人”变为“人是机器”（p. 172）。至此，沦为机器的人类可能被具有主体意识的超级人工智能取代，人类历史也走向终结。当然，作者也从提高人类自身反思性、订立合作宪章、建立人工智能社会的全球政治体系和设置技术安全条件等四个方面，对以上可能的危机提出防范建议。

结 语

《信息社会符号学》是第一本从符号学的角度讨论信息社会的专著，作者将关于信息社会符号学的全面构想总结成了16条鲜明的观点（唐小林，2022，pp. 19 - 21），其中的大多数都分别于各章节中详细论述。作者在著书过程中旁征博引，讨论的虽是当代最前沿的技术文化话题，但理论广泛来源于符号学、社会学、哲学、美学、文学等领域，而非仅仅局限于技术。

元宇宙的呼声甚嚣尘上，人们一方面期待着赛博时代的来临，憧憬着充满科技感的未来；另一方面，由于感受到目前阶段信息与技术给人类带来的异化与束缚，不免也对充满不确定因素的未来感到担忧与迷惘。该书的导论中，作者关注并指出了—个现象：信息社会“符号物”宰制下的“物符号”之“物”正在消失，从“物”之实存的角度观之，世界正在从“存有”走向“无物”。这一走向究竟意味着什么？目前，人工智能的发展正是这一走向的典型代表。在这样的趋势下，世界似乎也会沿着“人的离场—意义的消失—人类历史的终结”这一预言发展，“无物”带来的并非“物”的消失，反而是机器的制霸、人类的终结。但作者也强调，人类预测到的未来，从来就不会真正成为未来（p. 165）。作者关注现实社会当下的时代命题，却也时刻保持对信息社会中媒介、技术、消费等热潮的警醒与反思；为时代著书立说，阐释自己对当下问题的思考以及对未来趋势的展望，却也坚信，作为有充分主体性的人类，会有一个前人意料之外的未来。

引用文献：

- 德布雷，雷吉斯（2014）. 普通媒介学教程（陈卫星，王杨，译）.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 霍华德，菲利普·N.（2019）. 卡斯特论媒介（殷晓蓉，译）.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 唐小林（2012）. 寻找灵魂：建立一种主体符号学. 学术月刊，4，100 - 103.
- 唐小林（2015）. 符号媒介论. 载于曹顺庆，赵毅衡（主编），符号与传媒，2，139 - 154.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 唐小林（2022）. 信息社会符号学. 北京：科学出版社.

□ 符号与传媒 (26)

赵星植 (2022). 元宇宙: 作为符号传播的元媒介. 当代传播, 5, 36 - 39.

赵毅衡 (2012). 符号学.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赵毅衡 (2013). 广义叙述学.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Dyer-Witheford, N. (1999). *Cyber-Marx: Cycles and Circuits of Struggle in High-technology Capitalism*.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作者简介:

谢林杉,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四川大学符号学 - 传媒学研究所成员, 主要研究领域为符号学、媒介学。

Author:

Xie Linshan, Ph. D. candidate of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member of the ISMS research team. Her main research fields are semiotics and mediology.

Email: xlsummer@163.com